



科学对待马列主义

——读毛泽东《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

□ 周 栋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收录了1959年2月14日毛泽东会见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马特的一篇谈话，这篇谈话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为标题。它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对待马列主义的科学态度，即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必须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既看到“马列主义至今未变”的方面、也具体分析个别结论是否适用，以便科学地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

必须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

马列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致力于实现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毛泽东谈到，“中国的党一贯遵守马列主义的原则，因为它是普遍的真理”。他分析指出，马克思成功地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它既“正确反映客观世界”，又“认为世界是联系的、发展的”，这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人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出发点和方法，坚持这些原理，才能真正揭示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本质，从而实现人类解放。所以，毛泽东指出，马列主义指导中国人民找到了方向，确定了道路，提升了理论水平，中国革命从此走向了胜利。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坚持和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结果。在谈话中，毛泽东详细指出，“马列主义应包含三部分：一、马列主义的哲学，这是理论基础；二、马列主义的经济学，这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

来考察经济现象的学说；三、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比如关于阶级斗争、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等的学说”。其中，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革命学说”是“运用这个世界观来观察与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通过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世界观和革命理论，中国共产党认清了中国情况，找到了中国道路，取得了革命胜利。因此，马列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

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

科学理论只有用之于具体实践，才能真正发挥科学理论的力量；具体实践也必须借助科学理论的指导才能更好的开展。马列主义作为科学理论，必须结合具体实际才能发挥其作用。毛泽东谈到，中国的革命理论并不是完全照搬马列主义理论，“是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的结果，是真正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得到的。“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的人解决”。这是毛泽东坚持的一贯立场，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曾经明确表述，马列主义在实践中被证明是对的，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的“本本”，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毕竟“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而马克思恩格斯也一再强调，他们“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只有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用之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才能找到适合中国的理论和道路，从而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重要的理论成果，实现了革命和建设的重大胜利。毛泽东谈到，中国的两次革命“都是以共产党为领导进行的”，但并非马列主义所讲的“专政只能由一个政党执行”；我们的民主革命“可以说是几个政党联合进行的，但

是以共产党为首”；社会主义改造则依据不同阶级状况制订了针对性对策，比如对农民阶级和手工业者采取的和平改造政策，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的“和平赎买”“公私合营”等等。这都是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中国化理论，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些理论使“我们逐渐取得了人民的拥护”，并最终实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用科学的态度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

坚持和继承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发展和更新马列主义的具体结论才是对待马列主义的科学态度。毛泽东谈到，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是普遍真理，是“马列主义至今未变”的方面；同时又指出，有些具体结论是可以改变的，“例如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西方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结论”，但是这并不能否定马列主义的真理性。一方面，马列主义揭示了世界的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许多国家成立了共产党，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建立了新政权。这是马列主义的科学性特征，也是“至今未变”和“不能改变”的，需要我们不断继承和发扬。另一方面，马列主义也是时代的产物，其具体结论也受到理论和实践的局限，随着具体情况的变化发展自然会出现不适用的可能，这就要求我们要因时因地因事制宜，不断发展和更新它的具体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对待科学的理论必须有科学的态度”，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推动马列主义不断创新，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前些日子，看到《东南学术》有关卫兴华先生的专访，题目是“我写《马克思与〈资本论〉》”。先生写此书时94岁，讲授《资本论》67年，真正是“倾一生而治一学”的学术典范。我感慨之余，文末留言：“九四人生不懈钻研《资本论》，是真马克思主义；六七年华无悔育人‘教书匠’，乃我共和国脊梁。”被选为“精选留言”。这些话，是我跟随先生治学15年来的切身体悟和真实感言。《马克思与〈资本论〉》一经出版，就入选全国“2019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名单，可谓是实至名归。

《资本论》造就真马克思主义。先生从1950年师从苏联专家研读《资本论》，到2019年出版《马克思与〈资本论〉》，先生从未离开过《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近年来出版了《〈资本论〉的当代价值》《〈资本论〉简说》等著作，被称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国《资本论》研究权威”。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先生生于旧时代，追求新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所正规大学培养出来的研究生，一生事业与新中国一起成长，成就了一条朴实无华却硕果累累的学术道路。先生指出，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就在于这部伟大的著作“不仅可以为认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发展规律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现象、新问题和新特点提供经典范本，还可以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与方法指导”。正是秉持这样的理念，先生皓首穷经研读《资本论》，发表了千篇论文、数十部著作，成为“吾道一以贯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指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先生已经是94岁的高龄，但他却充满了像“90后”一样的工作激情，以真正的奋斗精神告诉我们什么是“重担不能压倒”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乐以忘忧、奋勇向前。

“工匠精神”乃我共和国脊梁。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扎根发芽、推陈出新，关键就是在中国的土壤上产生了一批经天纬地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和思想家，还有赖于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和研究者，他们甘为人梯、呕心沥血，将毕生心血倾注于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事业中，使共和国的立国思想与理念得以发扬光大、永葆青春。他们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理论研究，他们诲人不倦、传播真理的职业操守，成为引领社会思潮和探索发展路径的精神明灯，他们是名符其实的“大国工匠”，是共和国的精神脊梁。卫兴华先生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们从他的《马克思与〈资本论〉》一书中，能够看到他以94岁高龄孜孜不倦奋斗在讲坛论坛、报刊杂志、媒体专访、指

导博士的一切学术现场，凤凰卫视拍摄的《巨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卫兴华》纪录片，用白描手法充分展示了先生“一辈子一门课”的大国巨匠传奇事迹。2016年4月，先生把“吴玉章终身成就奖”的100万元捐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基金”，用于支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与人才培养。2018年9月，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开学典礼上，以马克思为榜样鼓励青年学子“要做好文章，做好大文章，做好振兴中华的大文章”，时年93岁的先生坦言“说实话，我自己一直都在奋斗”。这种行胜于言的教育，让学生在时刻有着学术的警惕与理论自觉。

先生给学生们的寄语是：“胸怀祖国，心系人民，志存高远，廉洁奉公，求真务实，至诚至信，追求真理，勇于攀登。”我知道，先生的榜样是马克思，先生是共和国的奋斗者，在书中他吸引了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写到：“使我最不愉快的是，必须打断自1月1日即我肝痛消失时起已有出色进展的工作（指《资本论》的写作）。”坐”自然谈不上，这在目前对我来说还很困难。白天哪怕只有短暂的时间，我也还是躺着继续苦干。”我想这是先生感同身受的引述。事实上，先生近年来的很多专著都是在床上完成的，他生动演绎了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奋斗精神。他教育年轻学生，要做到立学为民，治学报国。这种大道无形、诲人不倦的“教书匠”精神，正是共和国挺起的精神脊梁。

“勇于亮剑”堪称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在廓清理论迷雾，为马克思主义真理传播而亮剑发声方面，先生是一名真正的战士。对此，先生坦言：“我们的理论工作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还有许多复杂的理论是非需要澄清。澄清理论是非，才能有理论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做“战士”而不是“绅士”，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以先生之有教无类和学术成就，一例春风，推物及人，惟宽惟善，何屑与他人争。但真理缺席，谬种就会流传，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非方面，先生从不退让、敢于亮剑，上对庙堂、下对流俗，都知无不言、言必尽义，不避流俗，明辨道义，是真正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臬、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守正出新”彰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风采。先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资本论》研究，不是照本宣科，而是与时俱进、大胆创新。“守正创新”可谓是先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资本论》的主要特点。在《马克思与〈资本论〉》一书中，针对《资本论》生产力二要素论、三要素论的流行观点辨析中，先生再次结

守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初心与使命

——读《马克思与〈资本论〉》

□ 张 建 君

合最新的现代科技创新，阐述了他一贯坚持的生产力多要素论，指出科学是独立的生产力要素、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既会渗透到其他生产力要素中起作用，也会独立地发挥重大作用；在第14章专门探讨了马克思的财富论及其现实意义，提出了现代意义的马克思财富新理论，强调要更加重视科技人才与管理人才的作用，要在相同的或更少的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财富。这些研究，都展现出既坚守马克思《资本论》本意，又大胆提出创新理论的鲜明风格。



王夫之经世致用的治学之道

□ 黄 卉



王夫之，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王夫之的治学范围极广，于经、史、诸子、天文、历法、文学无所不通。他的学术思想广博精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国藩曾评价他：“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在王夫之宏大的思想体系中，其有关读书治学方面的思想也是值得重视的，他的治学之道对现代人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辨其大义，察其微言

南北朝时期，梁元帝萧绎在都城沦陷之际，下令将宫中十四万册藏书付之一炬，问其原因，梁元帝的回答是：“读书万卷，尤有今日，故焚之。”针对此事，王夫之作《论梁元帝读书》一文，对梁元帝的行为进行了深刻批判。其言道：“帝之自取灭亡，非读书之故，而抑未尝非读书之故也”。梁元帝陷入江山易主的困境是他个人治国无能、用人不当所致，与读不读书并无直接关系。王夫之还指出

梁元帝在读书方面陷入了巨大误区，即使读书万卷，也难有进益。作为帝王，梁元帝读书并没有与治国联系起来，而是“搜索骈丽、攒集影迹、以夸博记”，只读那些辞藻华丽但对其修身治国毫无益处的骈文。可见，于梁元帝而言，读书只不过是装点门面的工具罢了。王夫之批评他“颺志气于寻行数墨之中”“得纤曲而忘大义，迷影迹而失微言”。

鉴于梁元帝的教训，王夫之提出读书应以“立志为先”。他指出，“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坚定志向再读书，才能学有所获。读书若是漫无目的，心志就会被书中内容所左右，游移不定，甚至被异端邪说所迷惑。他认为“志立则学思从之，故才日益而聪明盛，成乎富有；志之笃，则气从其志，以不倦而日新”。只有确立读书的志向，才会在读书的过程中思考书中的道理，每天有所进益，孜孜不倦。

王夫之还指出了读书的目标和原则，“夫读书将以何为哉？辨其大义，以立修己治人之心也；察其微

言，以善精义入神之用也”。这就是说，读书首先要把握住书中宏大的旨意，从而确立自己修己治人的根本法则；其次要体察书中精微的言辞，从而熟练地掌握书中的奥妙变化，并将其运用于洒扫应对的日用之道。读书的根本目的在于将书中的道理与自身的现实处境联系起来，融会贯通，学以致用。

行难知易，学思结合

王夫之认为读书不应该局限在书斋当中，只学习书本知识，而应该坚持知行相资，学思结合。王夫之在批判程朱理学“知先行后”和王阳明“知行统一”两种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树一帜的知行观。王夫之指出“知行相资以为用”，说明在人们获取知识的过程中，知和行的功能相异，但是二者的相互结合能够使“知”“行”双方都能受益，有助于读者去更好地认知事物。在论述“知”和“行”的关系时，王夫之还提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观

点，表现出了重“行”的倾向。他认为“知”是“以行为功”的，在“行”的过程中可以获得“知”，但是仅靠“知”的过程无法获得“行”，更无法获得真知。只有躬行实践，才能获得真知，因此王夫之认为“行难知易”。从内在关系上看，王夫之“行可兼知”的观点与我们现代认识论意义上的“实践出真知”思想具有可通约性。

王夫之也非常重视学思结合。他在《四书训义》中指出：“致知之途有二，曰学，曰思。学则不恃己之聪明，而一唯先觉之是效；思则不循古人之陈迹，而任吾警悟之灵。乃二者不可偏废，而必相资以为功。”“学”与“思”是学习的两条途径，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学”是“思”的前提和基础，是思考的材料，只有博览群书，才能知识常新。在拥有一定知识储备之后再行独立思考，知其然之后，还要探索其所以然。这个思考的过程就是对学习材料的吸收和升华，经过“学”与“思”的结合，读者才能形成自己的判断和见解。王夫

之说“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动”，就是强调了学思结合的重要性。

经世致用，通达权变

王夫之生活在明清交替的动荡时代，洞悉世情的他极其反对空谈性命义的理之学，力倡经世致用的学术主张。王夫之批评心学注重内省、鼓吹“心悟”的为学路径，认为这种轻视知识的清议思想只会助长“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不良学风。而面对明朝后期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那些高谈性命义理的学者们却束手无策，深刻暴露了清谈思想的弊端。

面对“天崩地解”的社会巨变，王夫之在参加抗清复明运动失败后选择了避居山野。但是他并没有消极遁世，而是对历史和时局进行了深刻反思。他强调要把学术研究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以著说为武器，寻求挽救社会危机的良方。王夫之经世致用的学术主张在其史论思想中表现得最突出。他指出：“所贵乎史者，述往以

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强调要以史为鉴，以“求治之资”，通过深入思考总结历代王朝盛衰的经验教训，来为现实社会服务，充分发挥史书经邦济世的作用。王夫之指出，在读史的过程中还必须通达权变，他说“三代之法，不可挟以为名，治后世之天下”，因此不能盲目效仿古代的经世之法，需与时代需要和趋势相契合，评史论政，找到一条能够切实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革新道路。王夫之也亲自践行了这种经世致用的治学之道，他结合自己对历史和时局的思考，对兵戎、赋役、礼制、刑名等关乎国计民生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旨在“去危即安、兴利除害”。

王夫之生平践履笃实，在读书治学上反对空谈义理、重视经世致用；在安身立命上，始终坚持士人精神、践行君子人格，追求外王却能够挣脱名利的樊笼；在大道不彰时能够守静持重、潜心著书。在时代潮流的激变中，“经世致用”是王夫之的治学思想中一以贯之的特点，这反映出一个思想家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时至今日，我们仍能从王夫之的治学思想中获得深刻启发：读书首先要立志得法，体察书中的微言大义；其次要慎思笃行，正确处理“知”与“行”的关系；最后要通达经世，为现实的社会人生服务。